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42
13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四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

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芬奇先生

理事国： 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意大利)

博亚先生

周南先生

勒孔特先生

海恩斯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米尔扎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松德贝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6-81360/A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就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发动的“侵略行为”提出的控诉

- (a)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非洲统一组织驻联合国助理执行秘书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6)
- (b)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8)
- (c)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12123)
- (d)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4)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前几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提议邀请乌干达、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卡塔尔、肯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几内亚、索马里及南斯拉夫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毛里求斯代表哈罗德·沃尔特爵士；乌干达代表阿卜达拉先生；和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韦希马尔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肯尼亚代表韦亚基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另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印度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安理会同意下，我提议邀请印度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印度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当前议程上的项目。在请第一位发言人以前，我要提醒安理会各理事：除了议程上所列的文件外，和讨论项目有关的文件如下：S/12131, S/12132, S/12134, S/12135, S/12136 和 S/12140。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巴拿马共和国代表团高兴地同以前各位发言的人一道表示非常热烈庆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七月份主席，因为我们确信，你执行这项艰难的职务时，一定工作辉煌。

我国代表团也要对圭亚那杰克逊大使担任六月份安理会主席期间的卓越成就，表示敬佩；这些成就使他、他的国家和拉丁美洲同感光荣。

巴拿马代表团十分沉痛地听到中国杰出的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朱德阁下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我们对伟大中国的这位传奇性英雄同申追悼。让我向赖大使、周南先生和中国常驻代表团的成员重申我们最诚挚的哀悼。

国际上著名人物、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博士去世，我国代表团对德国人民和政府的这件无可弥补的损失，表示吊慰。

印度尼西亚发生地底震动，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巴拿马代表团也为此表示

和该国团结一致，同时我们希望国际提供大力和慷慨的援助，不但减轻痛苦，而且应付遭受地震影响的人民的需要。

在乌干达发生的破坏和平事件，其原因较表面所呈现的要深刻，值得国际社会加以认真和持续的注意。这个悲剧，以劫持法国飞机为开端，其原因在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的报告里到处都可以找到；这个报告提到以国家为对象的政治恐怖主义及其基本动机时，认识到一个社会团体或一个民族，当其权利受到践踏，当其遭受政治、社会或经济上的冤屈而凭借任何合法方式都不能获得正义时，他们就会使用恐怖主义。

但是还有其他原因是世界局势所造成的，需要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特别是最发达国家的具体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更加尖锐化，就会使社会发生大混乱；除非对它们优先处理，否则就会使人类不能安定。本月第一个星期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会议的报告内说明了最紧急问题之一，它说：除非各国共同作出更大的努力，否则到了一九八五年就会发生全世界粮食缺乏的灾难。另一方面，最近在温哥华举行的生境会议已经提出了证据证明世界人口目前是40亿人，在三十年之内将增加一倍。因此公共服务也得增加一倍。卫生问题会真正伤脑筋。根据同一来源：虽然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十住在农村，但有持续的变动，在二十五年之内，大多数人民会集居在城市，这样自然就会使都市问题更加严重。联合国专家估计：为了应付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二十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的数目，必须等于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来所创造的工作机会的数目。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住在发展中国家，过着不安定的生活，而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却集中在世界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的手中。另一方面，住房问题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一九七四年发展中世界进口了二千七百万吨的谷物，预期在下个十年要跃升到八千万吨。拉丁美洲的半数都市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非洲和亚洲的若干地区，只有五分之一的住房有自来饮水。据联合国专家估计，有五亿儿童——也就是说，世界人口的八分之一——营养不良。与这幅不祥的社会景象相对照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军事

支出的最近估计；一九七三年的军事支出如以一九七〇年经常价格计算，当在2,050亿至2,350亿美元之间；如以一九七三年价格计算，当在2,400亿至2,750亿美元之间。这个数目高过南亚、远东和非洲各发展中国家国民总产值的总和，远超过拉丁美洲的总产值。

据专家的意见，这些情况将在未来几年替人类住区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所提到的各项因素凑在一起，会促进人口和贫穷集中都市，而且会引起恐怖主义，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国家的恐怖主义。

巴拿马特别重视毛里求斯总理、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就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的“侵略行为”所提出的控诉；已经有许多非安理会理事国的国家出席这几次会议，正式表示它们的意见，这显示出这种侵略行为的影响。

巴拿马代表团借此机会向非洲统一组织重申我们绝不改变的反殖民主义、反对任何种类歧视的立场。在联合国，我们许多年来都是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以坚定不移的态度为消除非洲不人道的种族歧视制度而斗争。种族隔离是压迫人民的最可耻的方式，巴拿马政府和人民一直强烈反对。无论在何地，巴拿马都是以明白而确定的态度，声讨违反历史潮流，顽固地对大批非洲人民实行最可耻、最荒谬的剥削的“白种优越”政权。

巴拿马心腹地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仍然留有血淋淋的创伤，因此，对于侵犯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件，不能漠视。

巴拿马深知殖民地的情况是如何的痛苦，因为运河区殖民地把这个国家分割，抢走了巴拿马人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个主要港口。这种不可容忍的情势是紧张局势的永久根源，而且使我国人民面临无法预见的后果和危险。七十三年以来，巴拿马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一项不平等条约而受到的践踏，在现代，这项条件毫无理由存在。

因此，巴拿马自然要坚持联合国非殖民化的政策。今年恰逢美国独立两百周年，同时，我们也庆祝由巴拿马倡议举行而和民主人权、基本自由、国家主权和反

殖民主义的最高价值相连的《同盟会议》，我们希望能达成一项最后协定来缔结一项符合巴拿马主张的正义而公平的条约。

和美国进行的谈判已经拖延了十二年，由于北美洲的大选，还要延长一些时日。不过，我国政府首脑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已经指定一九七七年为巴拿马非殖民化的预定日期。托里霍斯已经宣布：到一九七七年，巴拿马将不再忍耐，美国到那时也无从借口。

巴拿马不能置身于历史潮流或现代思潮之外。所有主要国际运河，除了巴拿马运河以外，都在领土主权管辖之下。正如苏伊士运河属于埃及，基尔运河属于德国一样，巴拿马运河无疑地应该属于巴拿马。

在这次辩论中，很多国家指责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显然不力。说这种话的人忽视了本组织的建设性成就，它好象罗马神话里的狼，以它的乳汁维持了许多国家的政治生存。但是，本组织并不因它对人类有利的创造性活动而免受攻击。它象普罗米修斯一样，听任那忘恩负义的秃鹰大吃它的内脏。

那些批评联合国的人其实不是指责本组织而是指责各会员国政府。旧金山宪章企图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努力在这个体系内改组国际社会，它们不仅承诺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依宪章第二十五条，同意接受和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安理会在辩论关于毛里求斯总理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地位提出控诉的议程项目时，必须讨论两个暴力行为：一个是一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极端分子的行为，他们自称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朱埃瓦拉集团加沙大队，劫持了法国航空公司飞往希腊的飞机，同时扣留了二五六名人质，把他们押至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另一个是以色列陆军部队作出的行为，他们侵犯乌干达共和国的领空和主权及领土完整，进行援救被扣以色列人质的行动。

国际法院已经自己订立了国际非法行动的定义。它说明这种行动是指违反国际法规则因此构成责任的行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所产生的态度而引伸出来的，它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从事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从事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会第178(II)号决议正就是根据我国巴拿马，提出的提案而通过的；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请国际法委员会编制一个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以巴拿马所提出的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为讨论的基础。国际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所编制的《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大体上是依照巴拿马法学家里卡多·阿尔法罗先生提出的案文；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规定：各国负有义务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外交；各国负有义务不在别国领土内煽动内乱，也有义务防止在本国领土内组织促进此种内乱的活动；一切国家都有义务不使用武力作为施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并不得从事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别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或以与国际法律和秩序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从事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各国采取单独地或集体自卫对抗武装攻击的正当权利。

我国保卫人权和国际间友好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一点的历史证据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的第一次草案，都是由巴拿马提出作为依据旧金山宪章成立的本组织的优先工作之一的。无疑地我们正在讨论的案件中有两个没有法律根据的暴力行为——一个是由联合国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作出的行为，另一个是若干平民在政治情绪冲动下作出的行为。

如果照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的定义，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明显地，以色列军队在恩德培机场进行军事行动侵犯乌干达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是未经《联合国宪章》准许使用武力；因为《宪章》只准许由联合国采取强制行动，或以单独或集体的正当自卫对抗武力攻击。以色列并没有遭受乌干达的武力攻击，因此它的行动是不正当的。以色列援引正当防卫权利作为它的行动的理由，主张恐怖主义的人的头脑一样，认为为了对付蛮横、不正义、剥削基本

人权及践踏人民自决权利的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行为，都是正当的自卫行为。但是，解释现代暴动的人认为，恐怖主义作为革命斗争的方式，已经失败，有组织的政治恐怖主义是政治斗争的反常行为。可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顾一切把恐怖主义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极端主义分子仍不放弃这种工具来鼓动舆论和策动群众。

大会关怀到这种行为不断增加，而且越多越残暴，危及无辜的生命和损害基本自由，因而通过了第 3034 (XXVII) 号决议，题目是“防止危害或杀害无辜生命或损害基本自由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和由于困苦、挫折、怨愤和失望，以致有人不惜牺牲人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以求实现彻底改革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的研究”。

这个决议规定设立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它有三十五个成员，由巴拿马现任外交部长阿基利诺·博伊德博士担任主席，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一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会议。它的工作成果就是向大会第二十八届常会提出《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作为补编第 28 号 (A/9028)。对这个报告还没有采取行动，不过它将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议程，同时，秘书长在最近几年的年度报告内也一再提到了这个报告。

在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中，委内瑞拉提出了一件提议草案，这个草案大略表明了委员会对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根本原因的关怀。委内瑞拉的提议说，国际恐怖主义是：

“个人或一群人为了制造恐怖以求达到政治目标，在外国境内公海或在公海上空飞行的飞机上危害或杀害无辜的人类生命或损害基本自由的任何暴力威胁或暴力行为。

“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政权所执行的非人道迫害措施以及一切帮助实行外国统治、剥夺人民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权利和其他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措施，也应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为了制造恐怖以求达到政治目的而在外国境内，由外国人或对外国人进行的严重身体伤害、谋杀、扣押人质、绑架、寄发书信炸弹和损害物品与财产，也应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因为这构成了破坏社会道德的罪行和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A/9028, 第30页）

我们认为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辉煌的贡献，在将来任何行动中都应加以考虑，尤其是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及其防止的办法。有些代表团已经援引国家保护在外国领土受绑架的国民的权利，作为以色列行动的理由。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海牙国际法院虽然承认，一国有权保护遭受别国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侵害的本国国民，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同时认为此项权利只限于采取外交或国际司法行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只能采用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载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

因此，这个案件里所采的军事行动，不是宪章里规定一个国家有权以和平解决争端办法保护本国国民的典型例子，而倒是强国时常用以对付弱国的武装干涉行为。

恩德培机场的悲惨事件，造成惨重伤亡，使乌干达、以色列、德国、英国和阿拉伯各国许多家庭万分沉痛，需要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秘书处采取一致行动，来消除恐怖主义行为及劫持飞行中的飞机，严重危害空勤人员生命和安全，毫不考虑基本人道的行为的成因和动机。

这类行动中，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场，无疑地，其根本原因是愤恨目前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不可剥夺的权利迟迟不能实现，根据大会的决定，这些权利包括人民自决权利和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我们主张尊重和承认这个地区一切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安全与公认的疆界内不受武力威胁和武力行动和平相处的权利。

巴拿马政府对提出决议草案供安理会审议的各理事国深表敬佩，但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宣布谴责——无论谴责以色列或谴责负劫持法国航空公司飞机责任的那些人——或是判决对乌干达共和国赔偿就可得到解决的。

因此，这两个决议草案在安理会提付表决时，我国代表团将予弃权。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向我个人亲切表示的祝贺。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七月份主席，同时向你保证罗马尼亚代表团对你的信心和充分支持。你个人杰出的才干和你悠久而丰富的外交经验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大家极为赏识的，我们确信，这最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重要机构的讨论会以妥当、公平的方式进行。

我也很高兴能够借此机会提到罗马尼亚和贵国意大利之间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两国血统相同的人民之间长久以来都有传统的友好联系。

同时允许我对前任主席圭亚那外交部长威尔斯先生阁下和杰克逊大使主持漫长的六月份辩论时的优异表现，表示适当的赞扬。

罗马尼亚代表团同你一道为兄弟的中国人民因朱德同志的逝世而遭受的巨大损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哀悼。朱德同志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的社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也要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任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的逝世，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哀悼。

安理会现在正审议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就以色列向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发动军事袭击提出的控诉。从有关各方叙述的实况可看出，以色列军队采取武装行动的目的是救出被拘留在机场的人质，这群人是六月二十七日被劫持的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上的乘客。对恩德培机场发动的军事袭击结果造成许多乌干达人民的死亡和重大的物质损失。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在审议这个议程项目时，应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本组织通过的文件中所列的国际法规定。

关于这一点，应强调本组织的宪章所载的一项原则，即各国负有义务不对任何其他国家从事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个原则为绝对法的一部分，也是普遍适用的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确认各国行使单独或集体合法自卫的权利，但是有关国家只有在遭受武力攻击时，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理事会所审议的这个案件并不符合宪章第五十一条的条件。

罗马尼亚反对并谴责在国际关系上从事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对其他国家领土发动的武装攻击和任何侵害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企图，不论这些行为是在何处发生，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或是以何种借口发生的。经验证明，这种武装攻击和涉及使用武力的其他类似行为不但不会导致国际问题的解决反而只会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我们绝不能准许或容忍这些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完全违反国际法，悍然侵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企图以武力来取代法律。

有人在这个辩论中已强调过，对恩德培发动的军事袭击是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机被劫持而触发的一连串事件之一。

关于这点，我们要再一次说明罗马尼亚反对和谴责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劫持飞机和扣押人质。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极其消极的现象，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损害到各国间的合作关系和各国人民彼此之间的信赖。

对无辜人民采取的恐怖主义行为，即使名义上是为了某种崇高事业，也不能算是一种革命斗争的手段。这种行为从来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反地，这些行为会损害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的真正利益。

此外，我们不应把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

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是一种正当的、合乎人民深切愿望的合法斗争。这种斗争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国际法的准则，并已得到本组织这样的承认。因此，罗马尼亚衷心支持各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并决心继续予以支持。

以色列军用飞机侵害乌干达的主权，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因此，是不可容许的，并且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家采取这种预谋的武装行动侵害别国的主权，不能为了辩护而同少数个人不负责任的行为相提并论。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根据宪章，采取坚定立场对付侵害乌干达的暴力行为，并支持尊重该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确保国际法胜过武力。

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只有各国政府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才能制止国际生活上暴力和不法行为的激增。

因此，我们相信，联合国和这个安全理事会，为了寻求适当的补救方法，应该更加注视国际生活上这种制造和鼓励人民之间的仇恨、妨害和阻碍国与国间的关系的消极现象。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行动，如果包括预防措施在内，并使各国协调努力达到尊重国际法律和正义的共同目标，使整个人类毫无歧视都得到利益，那就会更加有效。

主席：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的祝贺以及对意大利代表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表示亲切信赖的话。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我的朋友达特库先生提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之间很好的关系和我们两国血统相同的人民在历史上的联系。

安倍勋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七月份的主席。我尤其高兴看到你担任主席，因为你不仅是与我国一向保持传统关系的意大利最杰出的大使之一，而且许多年来你在公务上和私人方面都以特别热烈的友谊对待我。我国代表团期望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同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一同工作，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充分信任、支持和合作。

我国代表团也要向圭亚那外交部长阁下和杰克逊大使表示祝贺和感激，他们在主持六月份非常繁重的会议工作时所表现的态度是值得效法的。

我国代表团同许多其他发言的人一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朱德委员长的不幸逝世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最诚挚的哀悼。我国代表团也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任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先生的逝世，向该国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哀悼。

我国代表团非常留心地听取了前几位代表的发言，尤其是这个争端的主要当事国乌干达共和国和以色列的代表的发言。

首先，我要声明自从这件事情在六月二十七日发生以来，我国代表团一直非常关心注视它的发展。因为日本自己近几年来有好几次遭受类似的劫持事件和国际恐怖主义之害，所以我们对此特别深切关怀。

我国政府坚信，国际恐怖主义，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构成残害人类一种可恶罪行，必须受到世界大家庭最强烈的谴责。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消除这种残害人类的罪行，必须彼此尽力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

基于这种信念，日本政府在拟订《海牙公约》等国际协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是《海牙公约》的一个缔约国。我国政府也不断地充分支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防止和消除劫持行为和国际恐怖主义为目的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出席安理会的理事国或参加辩论的代表团之中，有那一个敢宽容象目前这个案件里的劫持事件和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彻底执行我们的共同意见。

首先，必须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防止这种罪行。假使这些措施失败，这种罪行还是继续发生，那么我们就必须不顾我们之间存在的政治或其他歧见，联合起来努力抵抗共同的敌人。当然，我们最高的努力目标应该是拯救在这种罪行中受害的无辜人民的生命。法国航空公司飞机被劫持，跟我刚才所说的情况正好一样。这一次，预防的措施又失效了，但是在劫持事件发生后，所有有关国家的政府都为拯救人质作出共同努力。但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尽管救了大多数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人丧失了生命。我国代表团向这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哀悼。这个事件的悲惨结局再一次地强调我们必须重申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防止和惩处办法。

法国航空公司飞机劫持事件是在一个非常情况下结束的，就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内采取了军事行动。 尽管以色列常驻代表已向安理会详细说明促使以色列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和情况，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这是以色列侵犯乌干达共和国主权的行爲。 这个事实是不容忽略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规定，任何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受到别国的尊重。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象以色列代表所说，已经符合国际法上承认可以行使自卫权的条件呢？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保留意见。

哈罗德·沃尔特爵士（毛里求斯）：主席先生，昨天辩论时，有人问你一个很有关系的问题：“一个程序问题什么时候才算是程序问题？”那么，我今天希望你同意，我们不能凭个人喜不喜欢来进行这项辩论。 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明白的问题，而且你们都同意应该讨论这项问题。今天有别的东₁西笼罩着这项问题，这些东₂西同摆在安理会面前这项问题毫不相干。 不止如此，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还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按照一切程序规则，这草案是同安理会面前的问题相违背的，是不能接受的。

提出这个程序问题，是因为今天讨论的事情，离开了我们面前很明白的这个问题，不仅超出这个问题以外，而且同辩论无关。 我谨认为，为了使我们辩论依照正常正确的程序，我们就不能容许辩论同安理会面前问题完全无关的事情。 如果我们希望辩论这个问题，就把它列入议程吧；然后我们再进行讨论。 但是，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清清楚楚的，并且已经得到安理会的公认， 难道我们还能接受这项决议草案吗？

主席先生，我以万分诚恳的敬意—— 你可以放心，我会通力合作帮助你处理困难的任务—— 认为你应该裁定可不可以把一件毫不相干、完全无关的事情引进辩论里，来扰乱辩论，同主要问题混在一起呢？

主席：我回答毛里求斯代表提起的程序问题，提醒他注意，几天前的会议逐字

记录里，这项程序问题已经提出，并且得到解决。不过，我因为尊敬你，所以在你提出程序问题的时候，没有打断你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请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很抱歉在这个时候发言，但是我要支持毛里求斯外交部长阁下提出的程序问题。事实上，我国代表团昨天也提出了同样的程序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主席先生，我向你呼吁，我们仍然希望你尽一切力量，使讨论始终遵照而不超出安理会议定的主题和项目的范围。

主席：我提醒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几天前，他自己在谈到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时说，他也认为没有人反对提出决议草案——任何代表团都有权提出它认为同讨论中的议程项目有关的决议草案，而且这是他自己承认的权利。所以我想，这更支持了我刚才的说法。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昨天我评论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团的这一行动，并表示失望，因为这个行动没有按照安理会正常的协商程序，礼节及惯例。

正如联合王国的代表说的一样，规则中没有任何规定可以禁止他提出决议草案。我回答说，我知道没有任何规定禁止他提出决议草案。但是现在提出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代表团有没有权提出决议草案的问题；毛里求斯外交部长提出的问题是：这项决议草案相干不相干。

不相干。它同我们讨论的项目无关。这就是毛里求斯外交部长阁下所说的要点，我也同意他所说的这一点。

主席先生，我们信任你；我们希望你指导我们的工作走上正确的道路，使我们在安理会进行的讨论得到成功。

主席先生，你是在“指挥”我们的工作，如果你用贵国优美的语言说，就是
" Chi commanda fa legge ".

主席：我希望我们的工作不是指挥工作。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只想说，我同意我们会议的逐字记录中文本第 82 和 83 页所载利比亚代表昨天说的话。 他说：

“我只要纠正联合王国大使阁下。 我没有说他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决议草案。 我说这是一个礼貌问题……”（第一九四一次会议，中文本第 82 页）。

过了不久，他又说——而我非常同意他的话：

“这向来是一件麻烦的事。 这样以后，任何国家才可以提出决议草案”（同上）。

最后，他指责我“不正规”。

我看，不管他认为我正规不正规、有没有礼貌，是否没有经过正常的协商，对他或对毛里求斯外长来说，不应该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我们违反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 任何代表团都有权提议任何决议草案。 我们提出了一个草案。 如果草案提付表决的话，以后补救办法便要看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了。

主席：我呼吁我们利比亚同事和朋友以及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不要提出程序问题。 我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这是我所深信的。 这个问题昨天已经解决，我想我们不应该重新提到这项问题。 目前事实上，我们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进行辩论。

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首先，请让我对前任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的逝世，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悼念。海涅曼先生是一位品德卓越的领袖。

谢谢毛里求斯外交部长纠正我的印在记录上的发言的一段拉丁引文的错误。假如他没有受到感冒困扰，我确信他会注意到我在发言时已经纠正了这个打字上的错误——很遗憾，临时记录上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不管怎么样，我谢谢他提请大会注意这一点。我很明白他的关切，因为我深知他在我的发言中再不能找到其他的错处了。

顺便提一句，我谢谢他在提出程序问题时所表示的关切。

我相信，他要提请我们大家注意我发言中的虚构的错处，是由于他自己的方便，而不是由于他的道德或法律上的信念。我这样说，由于我们都从同一卓越法律学中心得到同样的教育。我们两个人都吸收了自然法则和国际法的原则，能够证明以色列在安塔培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太清楚了。

随着我们分析人质们的详细叙述和获得新的证据之后，证明乌干达的同谋关系的证据日益增加。我们从旅客们的汇报知道，劫持人员的领袖维尔弗雷德·伯泽在飞机刚离开雅典就拿出地图来，手中的地图已经清楚地划好雅典—本加齐—恩德培线。我们知道，而且事实上已经发表过，在飞机降落恩德培以前，伊迪·阿明就派了他的私人飞机去索马里接恐怖份子的头子，把他带回恩德培。在飞机降落恩德培后，他就控制了飞机。

此外，安理会的理事国到现在已充分体会到，四名恐怖分子在雅典劫持了飞机。我提出了证据已经得到其他代表的证实。这些证据显示出这架飞机在恩德培机场得到大约五名恐怖分子的增援。劫持飞机的是四名恐怖分子。乌干达政府以军礼国葬了七名恐怖分子。换句话说，根据大家所说，也根据乌干达的言外之意，恐怖分子的增援是在恩德培出现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两辆乌干达官方的汽车载

送他们到现场，其中一辆是由穿制服的士兵驾驶的。

有趣的是，尽管绝大多数的证据都证实恐怖分子是在坎帕拉得到增援，但是不论是阿明总统载在第 S/12124 号文件的来文，还是他的外交部长七月九日星期五在这里的两次发言，都没有直接提到这一点。

我仔细地听取了毛里求斯外交部长的发言。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恐怖分子的增援在恩德培等待劫持者一事。就毛里求斯外交部长而言，他们并不存在。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发言时的说服力，只有他沉默时的说服力堪与比拟。

七月一日，在101名人质被释放后没多久，巴黎的美联社就发出了下列消息：

“刚刚被法国航空公司喷气式飞机劫持者释放出来的人质今天一早到达这儿。他们说三、四个全身武装的、看来象是阿拉伯人的人，当在雅典上空被劫持的飞机到达乌干达恩德培时，等在机场增援原来的四个劫持者。”

在以色列的救援工作完成后，法国的《世界报》七月五日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空中的强盗行为，其中包括：

“他们到达坎培拉后，刚刚降落就有四、五个持冲锋枪的巴勒斯坦人在机场同他们会合。”

在许多其他的报纸、杂志、和许多无线电及电视台上都有类似的报导。所有的报告都是基于被释放的人质和政府官员提供的资料。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不会怀疑劫持者事实上是在乌干达得到增援的。假如我们小心地读一读阿明总统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和他的外交部长的发言，就会发现他们无心地、间接地承认了劫持者事实上是得到其他恐怖分子在坎培拉增援的事实。在阿明总统的信中，他说：

“以色列入侵者立即向劫持者进行袭击，打死其中七人。”（S/12124，附件第1页）

在第 S/PV.1939 号文件第17页中，乌干达的外交部长也同样提到七个被打死的劫持者。阿明总统提到“其中七人”，这就意味着劫持者不只七个人。但是，我们还记得，在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雅典机场后劫持飞机的只有四个人。

因此，事实上阿明总统及其外交部长都暗中承认，原来的劫持者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得到更多的恐怖分子的增援。除了乌干达容许四、五个阿拉伯武装恐怖分子增援加入劫持者行列的这一事实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更好的证据，来证明乌干达参与这一罪行呢？

此外，那些在坎培拉接应劫持者的恐怖分子发挥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证明了恩德培那一部分劫持是一件小心计划的工作，没有乌干达政府的同谋是不能进行的。被毛里求斯外交部长正确地称为最受人尊重的《纽约时报》访问了一个被释放的人质，米歇尔·库若先生。下面是七月六日的报导：

“库若先生说，虽然那个西德人在飞机上很明显地是个指挥，但同样清楚的是，那四个劫机者只是这个阴谋中的士兵而已，他们除了俘获人质和使他们安静以外，没有就人质进行磋商的权力，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的权力。

“在恩德培机场迎接他们的那三个阿拉伯人才是有权作进一步决定的人”，他说。命令来自其他地方。其中的一人讲西班牙话。”

换句话说，除非被劫持的飞机到达预先决定的地点乌干达——他们的头子在那儿等他们——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劫持工作就不可能按照计划进行。

假如乌干达是同这件事无关的，那支增援力量是怎样能够开到前面去的呢？那些说话动人自称是同阿明的乌干达和国际恐怖事业有着共同利益的代表们为什么不提到这一奇异的发展呢？这一发展的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论点不是真实的。

此外，假如他们没有默许的话，其他的恐怖分子在那里呢？恩德培救援工作后生存下来的两三个人是何下场？为什么没有根据一九七〇年的海牙公约把他们逮捕和交出来呢？

既然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已经详细地引述了报刊的话，现在也让我来引述一些。七月五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乌干达的同谋的详细报导。请让我引述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它总结了许多证实乌干达当局同恐怖分子狼狈为奸的报告。

来自巴黎的报告说：

“官员们和被释放的人质们今天在此说，他们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伊迪·阿明总统同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大型客机的劫持者在飞机降落乌干达前后进行勾结，劫持飞机……

“法国一位高级的消息灵通人士说，阿明总统拒绝让法国驻乌干达大使皮埃尔·勒纳尔和法国特使直接同劫持者打交道……

“他们还注意到，在飞机抵达恩德培的头二十四小时内，劫持者都休息去了，留下乌干达人在看守人质。

“其他指出乌干达总统同恐怖分子有关系的证明，包括法国外交家的评论和恐怖分子早些时释放的人质的报告……

“库若先生和他的十二岁的儿子奥利韦是上星期释放的人质中的两个。库若先生是一位法国的管理顾问，他担任人质们的翻译，代表他们磋商，要得到一些在苦难中的小小方便。

“库若先生说，他‘毫不怀疑’乌干达是事先知道劫机计划并已作好准备采取行动……

“库若先生说，在飞机降落坎培拉的国际机场恩德培以后，各人曾留在飞机上几小时之久。

“‘恐怖分子们收拾好他们的手榴弹，放进他们带上飞机的袋子里头。他们把在飞行过程中没有离过手一秒钟的7·65捷克自动手枪插在腰间，一起坐在飞机的前面，’他说在这以前，一直都最少有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监视我们’”

“库若先生说，这时候他有机会同机上的一个工作人员谈话，并建议制服四个劫持者——他们手中都没有武器，坐在一起——然后找一个人溜出去求救。

“‘但是，我们同意，劫持者们都好象觉得非常安全舒适似的。他们以前极其严格的纪律现在突然松弛了下来，这证明他们认为他们已在友好的地面上了！……’

“ ‘……全部时间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被劫持者和乌干达人看守着’ 。”

“库若先生说，在机场迎接劫持者的朋友们看来象是巴勒斯坦人。他又说：‘他们开着一辆有本地汽车牌照和外交牌照的日产公司的达特森汽车，来去自由，并带着武器。’

“ ‘在人质到达不久后，乌干达机场的民职经理就准备好了食物和饮料！库若先生说：‘但我还是要同他讲话，因为先是盘子不够，其后杯子也不够。我开玩笑说：“要照顾 263 个不速之客一定很困难吧？”’

“ ‘经理回答说：“但是我在等着你们来啊。”’ 库若先生说。”
七月五日的《华盛顿邮报》同样也刊登了一篇对阿明总统的详细控告：

“这星期早些时候释放的 148 个非犹太人的叙述，支持了以色列人的说法。

“被释放的人质谈到阿明拥抱劫持党徒的头子和四个劫持者，然后让乌干达士兵看守人质二十四小时。

“然后，在希腊上空劫持法航飞机的两个阿拉伯人和两个德国人回来，经过一夜的睡眠和沐浴后看来精神焕发。

“据法国和希腊人质说，后来最少有三个巴勒斯坦人同四个劫持者在一起。这伙人又得到更多自动武器的供应。

“一位在希腊船上工作的技工赫里斯托斯·萨兰蒂斯代表本星期早些时候被释放的七个希腊人说：‘我们由黑人士兵和大约一百名穿便服的人看守，他们同劫持者的关系极好，并同他们合作。阿明及其手下同劫持者之间充分合作。’”

毛里求斯外交部长所引述的、七月六日的《纽约时报》所报导的巴科斯机长的话，我是充分知道的。但是，被释放的大多数人质所证实的绝大部分的证据——而且事实上在报刊里也曾多次报导过——证明乌干达军队确实同恐怖分子一起看守 260 多名无辜的搭客和机上工作人员。我很遗憾，毛里求斯的外交部长宁愿不提

可得到的大量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乌干达同恐怖分子的同谋关系。

我在上星期五的发言中，已经提到过恐怖分子在乌干达人的帮助下，有时用武力，甚至用死亡的威胁，审问以色列人。七月十一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生动描写恐怖分子和乌干达人的审讯的文章：

“达汉先生在恐怖分子审问他关于以色列真实知道些什么的一段期间，被掌掴脸孔，背上被拳击，手指被扭向后。人家要他写有关以色列的详细报告。他就开始交出关于集体农庄的生活和他怎样摘葡萄柚的文件。

“他交了一份以后，一个乌干达人从他的手中夺过纸，撕成碎片，把它丢在地上，说：

“‘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知道的是军队的情况，基地所在，和将军的名字。’

“一个高个子拿枪的巴勒斯坦人和另一个名叫‘乔治’的人同四个乌干达官员一起审问。乔治曾经把枪顶住达汉先生的胸。”

鉴于被劫持的飞机上的260多名搭客和工作人员提出的绝大部分证据，我不能不把乌干达外交部长的两次发言称为本安理会许久以来所听到最厉害集歪曲、欺人报导、蓄意删节和彻头彻尾谎言之大成的言论。

我不希望列举每一个歪曲的说法来使大家厌烦。实例太多，一一举出太浪费时间了。但是，我国不能轻轻放过一个可恶的谎言。我有责任揭露乌干达总统及其外交部长的真正面目。

乌干达外交部长曾对安全理事会说：

“当她”——布洛克夫人——“在七月三日星期六傍晚身体有所好转时，医院当局便把她送回旧恩德培机场同其他人质会合。……

“以色列入侵劫持者扣留多拉·布洛克夫人等人质的地方恩德培机场，犯下了赤裸裸的侵略罪行。……入侵部队成员将所有死的、伤的和其他人质都带走。

“根据新闻报道和外交界消息，有一位外交家在星期天看到多拉·布洛克夫人在医院里。这些报道和消息都是捏造，没有具体的资料证明这件事。”

（第一九三九次会议，第112页）

这就是乌干达外交部长在安理会的发言。

我要重复一遍，这是个该死的谎言。七月四日星期日，在以色列完成了恩德培机场的救援工作后，一位英国的外交人员还在医院探访过布洛克夫人。联合王国代表已经在安理会上清楚地提到这一点了。这位外交人员报告，她由两个人看守着；一个小时后他回去，他没有获准去看望她。昨天联合王国的代表告诉我们，这位外交人员今天就被驱逐出乌干达。

现在我们又听到这个不祥的消息，即乌干达政府正在对驻在乌干达的外国人施加敲诈恐吓，要影响安全理事会的审议过程。换句话说，试图直接用最恶毒的敲诈恐吓来影响安理会的审议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安理会怎么能够对此缄默不言？对这种公然试图影响本组织的行为怎能置之不理？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怎能对于干预它们的民族主权的明目张胆企图置之不理？这个肮脏的事件不仅谴责乌干达政府，而且还谴责那些在辩论中发言反对以色列的救援工作的国家。它们不顾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因，即飞机的劫持。同时，由于政治上的便利起见，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风度提一提被拖出医院的七十五岁的老太婆的命运。她的可怕的命运。可能就象数以万计乌干达人的命运那样，其性质就象肯尼亚外交部长今天给主席先生的信中所描写的命运那样。

虽然我们充分尊重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和那些同他一起谴责以色列的人，但是他们不认为应提到布洛克夫人的命运，又不认为应呼吁乌干达当局找出她的下落这一事实，就使他们在这辩论中失去其在道义上的立场了。

布洛克夫人事件最悲惨地强调了乌干达的牵涉程度。请让我引述我们的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先生昨天在议会上的发言：

“布洛克夫人的失踪，是整个劫持事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所遭遇的命运，生动地证实了危及所有在恩德培的被劫持的搭客生命的可怕危险直到他们被以色列防御部队的出色的救援工作解救出来为止。 它又一次一劳永逸地证明了，那些迫不及待地国际论坛上谴责以色列执行对它的公民最初步的义务拯救他们离开危险而发出的论调，是多么空洞，毫无人道、道德和法律上的意义。”

我要再次请安理会注意下列一个被人很方便地遗忘了的事实：即在人质被释放后十天的今天，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仍然没有被放出来。 这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在这件事所引起的流血、恐惧、人的痛苦和折磨的背景下，可能是比较次要。

我不希望驳斥在这个议席上所作的许多发言，因为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言论是由那些同乌干达有着太相同的体制的国家提出的，我无需根据法律上或道义上的理由对他们的讲话作出回答。 其中的一个是索马里。 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索马里已经成为恐怖分子作业的中心和对邻国的一个威胁。 索马里代表甚至不恰当地误引我的一些讲话，这当然并不使我惊讶。 但是，我要提到一些已讲过的话。

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墨西哥给主席先生的信，即 S/12135 号文件，我们一直留意并了解墨西哥正进行着对危害到它的恐怖主义加以打击的运动。所以我们更加惊讶的是，当恐怖行为的受害者不是墨西哥人时，对于采取行动对抗这种恐怖，墨西哥竟未能显示出同样程度的了解。使人简直不能相信和无法理解的是，一时的政治上的权宜竟能控制了墨西哥政府，使得它来攻击一个小国这个小国为了自卫在对抗着墨西哥和以色列的共同敌人，那就是国际恐怖。

我无法隐藏我的诧异，南斯拉夫代表象过去某些时候一样，也看中了这个时刻加入这场辩论，站在谴责以色列的一边，以急于显示他与所谓不结盟国家的言论的忠实一致。假如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国家今日应当关心反恐怖的运动，假如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国家应当对这次劫机和恐怖行为的受害者致以哀悼的话，那就应该是南斯拉夫。请注意，南斯拉夫代表对乌干达说了哀悼的话。无辜的以色列人质在这次事件中也被杀死。南斯拉夫何以没有为他们说一个字？这真是可悲的事，看到南斯拉夫政府在本会堂每次遇到这种事，总是抢着带头谴责以色列，不管争论什么，它显然被极端的反以色列态度和偏袒今日世上发生的新的反犹太主义运动所蒙蔽。象许多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其他国家一样，南斯拉夫不明白这个使它受害不比别人轻的国际恐怖主义，终有一天要将它们的代表在这次安理会议席上说过的话吞回肚里。

老实说，比许多其它代表的介入此事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坦桑尼亚代表的介入。我感到遗憾是因为我本人很敬重他，也因为我与以色列的其他许多人对他的伟大教友、导师，坦桑尼亚总统极为尊敬，我曾有幸被邀作总统的客人。在他的法律论辩中，他轻便地忘记了他引用的法律根据的确证明，在国际法上，为了个别自卫或集体自卫，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行动是合理的，我相信这在我上星期五的讲话中不厌其详地引用国际法根据时曾经指出。他和另外的人引述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段，其中要求各国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让我再引用一次奥康乃尔在《国际法》（第二版）第303页中所说的话：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段应被解释为禁止以武力行动侵害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不是禁止在有限度的意图和效果内使用武力来保护本国的完整和其国民的重大利益，如果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无效的话。”

随着这场安理会辩论的进行，人们的心智变得迟钝，记忆变得模糊了。让我提醒安理会，我们是在谈以色列政府的一项要保护它的公民的决定；这些在恐怖分子枪口劫持下的一百多男女和儿童成了恐怖分子的人质，他们的生命都受着威胁，而抢劫他们的恐怖分子不承认任何主权，不遵守任何法律，并在过去显示出他们不受任何限制的兽行。

同是这一批人，他们杀死了手足被捆绑的外交人员；谋杀了手足被捆绑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并且在过去绑架了儿童人质，还打算杀害他们。这些人受到一个以种族主义者凶手为首的政府的帮助和唆使，这个凶手曾经赞美过同一批恐怖分子杀戮了手足被捆绑的以色列运动员；他在这个联合国里要求消灭以色列；他不仅赞美过希特勒的谋杀六百万犹太人，甚至还建议为希特勒立纪念碑——这一举使得苏联驻坎培拉大使也得告诉阿明总统，说他做得太过分了。

这就是以色列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有一百多名男女和儿童成为无辜的人质，被恐怖分子的枪口对准着，任何人都不会丝毫怀疑这些恐怖分子的意图就是要象他们以往的所做所为一样，实施他们的恶毒计划，杀害无辜的人民。这是每一位代表在讨论这题目时应在心目中看到的一个景象。

我对坦桑尼亚代表的许多意见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它们没有反映出他的真正想法或是坦桑尼亚政府的真正想法。

我断然拒绝他荒谬的将以色列的解救它的旅客的营救行动等同于攻击非洲。坦桑尼亚代表如何能说出这种话？

难道让恐怖分子在阿明总统的纵容下杀掉一百多名男女和儿童会使非洲增光么？难道要让这百多位无辜的受害者的鲜血溅洒在非洲土地上会使非洲增光么？是谁使非洲蒙羞？是根据国际法行使其权利以营救其公民的以色列吗？还是对

无防卫之力的75岁老妇发动英勇的战争的乌干达种族主义政权？

是谁在威胁非洲？是给了非洲这么多国家，连今天的许多国家在内，在农业、技术和保健方面这么多援助的以色列？还是在本周派遣了三十架战斗机去增援乌干达的那个国家，也就是利比亚政府？这些飞机要用来对付谁？又是谁在驾驶这些飞机？你们和我同样地清楚，它们是要对付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经常受到并且继续受到乌干达总统声明的公开威胁；而驾驶这些飞机的，其中就有巴解组织的飞行员。

是谁在威胁非洲和非洲人？

是拒绝参与阿明总统一九七二年提议侵入和轰炸坦桑尼亚的计划因而导致乌干达与以色列断交的以色列？还是那个在以色列和其它国家偶然出示地图说明侵入坦桑尼亚计划的国家元首？

蔑视非洲的如果不是用恶语诋毁有国际声望与地位的坦桑尼亚总统的乌干达总统，还会是谁？他用语的卑鄙可憎，由于我和我国人民对坦桑尼亚总统的崇高敬意，不屑于在此复述。

坦桑尼亚代表说，他“宁愿以原则为重而轻取权宜”。

你说的是什么原则？是在今日肯尼亚外交部长分发的文件中冷酷叙述的谋杀、绑架和盗行中所反映的乌干达的原则么？你在这里有没有说过一个字反对乌干达的这些原则？是原则还是权宜使得你这位杰出国家的杰出代表，和一个世界恐怖主义的发饷老板和中心并供给乌干达战斗机的国家利比亚，作为这个决议的共同提议国？你和我知道得同样清楚，这些飞机不会被乌干达用来对付以色列。

亲爱的朋友，假如你想讨论原则和权宜，千万让我们来讨论。但是让我们也把它说得一清二楚。我们不要片面地讲原则和权宜，正如我们不应片面地谈恐怖和营救的行动。

我只有重述我在星期五所说的：让我们不再搞片面性。如果恐怖是坏事，那就不论是何地、何人和在任何时候，它都是坏事。不论恐怖主义分子是什么肤色、

种族、宗教或国籍，它都是坏事。也不论受害者是什么肤色、种族、宗教和国籍，它还是坏事。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联合国没有能解决的问题。是将会祸及全世界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的话。

我聆听了巴基斯坦代表的意见，说老实话，如果这不是出于一位将全部政治反对者都关在监牢里的政权的代表之口的话，我会对他更尊敬些。这儿显出某一个国家代表的可怜相，它自己的人民被伊迪·阿明的种族主义政权残暴地赶出乌干达，但他却拼命要讨好他自己亲戚同宗的迫害者。一个人还能卑贱到何种地步？

苏联代表问我为什么不引用联合国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从事侵略的文件。苏联代表必须明白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通过的对侵略所下的定义受到所有法律界的广泛批评。那不是有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的陈述，也并不因此排除以色列所采取的这项行动。

当苏联代表问为什么以色列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的时候，我不知道究竟是他天真，还是他认为我天真。让我确切地告诉他说，至少在这件事上不能认为我天真，而我也毫无疑问他无论如何也绝不会天真。

我要问苏联代表：假如我们提出控诉，苏联会支持我们吗？为什么在飞机被劫持时苏联没有讲话？为什么他们在过去许多场合没有谴责巴解组织的恐怖行动？为什么在无辜的人质被扣押在恩德培时，他们没有发表声明或呼吁？为什么苏联代表甚至一字也不提多拉·布洛克夫人的命运？也不向乌干达代表为此事说一句呼吁的话？终究你对乌干达还是有影响力的。

难道苏联代表不明白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苏联阻挡了以色列每一次打算将案件提到安全理事会的尝试？二十二年来由于苏联的否决权，我们在安理会毫无办法。我们已经习惯了本机构里的讥讽，而我认为苏联代表的这个讥讽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向安理会控诉”——是最大的讥讽，因为他预先知道不论控诉的是什么内容，他都一定要否决它。

我注意到苏联代表的关切非洲领土的不容侵犯，我衷心希望他的感动人的关切

将会反映在苏联的政策和行动上。

苏联代表说起侵略问题和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的不容侵犯。谈到这些，我要向他致敬，因而考虑到它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国家在这方面干过的出色记录。我的来自中国的同事无疑能详述这一点。

让我向苏联代表保证，如果苏联当年的干预也象恩德培事件一样，只限于营救一百名人质和为时不超过53分钟，那么匈牙利人民在一九五六年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一九六八年该要太开心了。当时苏联费尽了心机来解释它的立场。谢尔盖·科瓦列夫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责任”中，解释苏联这种行动的理由如下：

“那些谈论社会主义同盟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法’行动的人，忘记了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也不能有脱离阶级而独立的法律。”

在文明社会中没有也不能有脱离人类高贵原则而独立的法律，这原则就是人的自由和尊严。我的来自苏联的同事，这就是以色列在恩德培所捍卫的原则。

也许在所有文件中更能显示政府态度的是在安理会分发的阿尔及利亚的文件，它昨天得到苏联代表的欢迎。

阿尔及利亚要为恐怖分子和劫持者说话的确是很自然的，因为第一架在一九六八年反以色列的行动中被劫持的飞机就是飞向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直接涉及那次行动，为将来的恐怖分子的活动指引了路向。阿尔及利亚在空中劫持、国际绑架和为恐怖分子的目的利用外交豁免权的历史上有过如此优异的地位，你很难期望它在国际恐怖主义的“群英殿”中放弃它的地位。他们不得不加入行动。毕竟阿明在两周前所做的，正是他们在一九六八年所做的。

在所有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某些代表试图忽略组织这次劫持的团体，那就是巴解组织。巴解组织发表了一个声明，自称与此案无关。这是说谎。这次劫持者所属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是构成巴解组织的一个成员。各理事国还记得过去巴解组织声称对“黑九月”毫不知情，尽管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副手实际上在指

挥它。 据苏丹总统说，那个集团就是一九七三年由亚西尔·阿法特亲自下令处死在沙特阿拉伯驻喀土穆大使馆的美国和比利时外交人员的集团。

巴解组织的政策是有案可查的。 它是基于最残酷的恐怖主义，在执行恐怖主义时，攻击的对象曾经是无辜的人民，包括毫无嫌疑的妇女和儿童。 这伙人曾经在基里亚特谢莫纳冷血地杀害孕妇，射杀手足被绑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劫持飞机，从事公开的行刺，在马阿洛特扣押小学生作人质，使二十多名儿童死亡和六十多名受伤。 这就是试图以恐怖的统治强加在西岸和加沙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头上的那些人，他们冷血地杀死那些被猜疑不同意他们的人。 这就是一九七四年计划在拉巴特行刺五个阿拉伯国家元首的那些人。 那时有十四名巴解组织的成员在摩洛哥被捕。 这些人是当约旦的总理瓦斯菲·特尔访问开罗时以最怯懦的方式处死了他的同一个组织的成员。 凶手之一对于从背后射杀了那位总理还不满足，他觉得必须在开罗谢拉顿旅社的台阶上当众饮他的血。

这就是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破坏了新加坡石油设施的同一批人。

这些就是控制了埃及驻马德里大使馆，将挟持了包括大使在内的三位职员当做人质的同一批人。

这些就是一九七三年在喀土穆谋杀了美国和比利时的外交人员的同一批人。 这就是那些曾经破坏过黎巴嫩国家的人，他们在安理会保持沉默时将它弄得四分五裂，使成千成万的人受伤或死亡。 这就是绑架了在维也纳参加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会议的部长，并挟持他们作为人质，然后被阿尔及利亚政府放走的那些恐怖分子，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行动简直是公然宥免该集团的恐怖罪行。 他们又从该地转往利比亚，并得到了利比亚贾卢德总理的欢迎和拥抱，而正是这批恐怖分子前一天在维也纳射杀了一位利比亚公民。

这就是将穷困、谋杀和刺杀带到中东地区，使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国际风气的那些人，而这种恐怖主义影响到每一角落的无辜人民。

当我正要讨论阿拉伯的顺从恐怖主义时，我也注意到埃及政府是非洲统一组织

决定将此事提交安理会的共同提案者。我要提醒安理会，埃及政府释放了那位怯懦的刺客，他将约旦的瓦斯菲·特尔总理刺杀在开罗的谢拉顿旅社前台阶上，然后饮他的血。埃及政府一九七〇年释放了一批“黑九月”组织的恐怖分子，他们曾将劫持的泛美公司巨型飞机降落开罗机场并在该机场将它炸掉。

我仔细聆听了利比亚代表昨日就程序问题所作的冗长发言，我必须承认我非常感谢他的关切——他今天再度表示了这种关切。除了一个作为付钱的主子和国际恐怖主义避难所的国家的代表以外，还有谁想避免在安理会讨论这项罪恶：国际恐怖主义？利比亚在给予国际恐怖主义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支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牵连到刺杀外国领袖，包括阿拉伯国家元首在内的企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不用我在此复述。

不过，选在这个时间提出程序问题，它后面的动机是非常明白的，那是由于埃及总统在周末透露了一些消息。据中东新闻社七月十日的报导，在上周因利比亚大使牵连到恐怖活动而将他驱逐的萨达特总统在对埃及“今日消息”周刊的访问中，公开地讨论了利比亚牵连到国际恐怖的罪行。

显然利比亚是被严厉通缉的国际恐怖分子的掩护所和避难所，参与劫持一架法国飞机到乌干达的这群人中就有这些恐怖分子的伙伴在内。

的确，正当安理会进行审议时，由利比亚资助和支持的一帮人正在苏丹积极地继续着颠覆苏丹政府的活动。

还需要什么其它的证据来证明利比亚已丧失对这问题的表决权，而且的确已失去了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的资格？安理会是负有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

最后，让我感谢那些代表们，他们有勇气明白而毫不含糊地站在人类体面和人类自由的一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祸害以及无论是以作为或不作为来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斯克兰顿先生的雄辩和动人的发言，以及敦促本机构采取行动的所有其他代表们的呼声，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响应，不论政治上有何分歧。

我促请在议席上已表示了对此事件的看法的国家，联合采取反对劫持者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

我确信将有许多人追随他们。今后一系列的会议将以多种途径决定，联合国是否将继续在暴君的掌握中堕落下去，还是将重新挑起其支持人道和国际和平的正义责任。

主席：我想在现阶段说几句个人的话，以便降低这场辩论的火气。

作为意大利的代表，我要说我乐于见到这场辩论因使用拉丁单字而愈益活跃。作为安理会的主席，我要说在议席上对立的代表团有幸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都懂得拉丁文。我认为这是对安理会现任主席的第一个，虽然是很小的鼓励的信号。同时我希望，各代表不会因使用拉丁字而过分沉溺于详述历史。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印度代表。我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贾帕尔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感谢本理事会各理事国让我们有机会对它们受理的控诉提出我们的意见。但是请阁下首先让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阁下担任本理事会主席的祝贺。阁下以你所代表的伟大国家人民特有的传统热忱和毅力处理理事会的讨论工作，所以我们确信理事会将因阁下的外交才干和经验而大为受益。

我要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杰出领导人朱德元帅的逝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我国代表团的哀悼。

我们也要为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先生的逝世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我们的哀悼。

我们参加这次辩论是因为由 48 个非洲国家组成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宣称，以色列对恩德培机场的袭击不但构成对乌干达的侵略，而且也危害整个非洲及国际的和平和安全。我们完全同情这 48 个非洲国家，并分担它们的忧虑——尤其是因为它们全是不结盟的，并且都是不结盟国家集团的成员国。

安全理事会受理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原因是这种问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情况——因当事各方和有关人士受到了可怖的阻挠而变得更加复杂的情况。

现在正在审议的悲惨事件的因果是与它们本身的过去历史分不开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需要在初步行动与行动的最后结果之间有所辨别，并对它们作出单独和综合的评价，因为这个事件充满了无法解答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明：印度政府一向是痛惜恐怖暴行、劫持飞机及将无辜旅客作为人质的。我们赞成大会第 2645 (XXV) 号决议请所有各国在其管辖范围内防止此种行为，并诉究及惩处此种罪犯。我国代表团也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安全理事会谴责劫持商用飞机的共同决定的一个当事者。

照法国代表所说的本案实情是：这一次劫持法国航空公司飞机的事件发生在六

月二十七日。 在这一方面，我要说明我国政府是毫无保留地痛惜这种劫机行为的。法国当局于发生劫机之后立即采取了各种步骤，通知它的若干使馆，包括驻乌干达的大使馆，提高警觉，并要它们获得许可，让法国的飞机降落，因为飞机上的汽油快用完了。

照法国代表所说的，驻乌干达的法国大使因此便与乌干达当局接洽，乌干达当局随即准许该机降落。

对于飞机降落之后的情况，现在有各种矛盾的说法—— 主要是因为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说法，而每个人都是从他各自的观察点出发的。 因此，永远无法完全知道事实真相，但是，有些事实却已经很明确地透露出来了。

事实是有关当事者之间开始的谈判拖延了几乎一星期，劫机者在这一星期中先释放了旅客47人，后来又释放了100人。

正当继续进一步谈判其余人质的释放条件和地点的时候，以色列显然得到一项结论：这些以色列籍人质的生命已经是十分危险了。

以色列军队随即袭击了该机场，救出了人质。 据报导，结果有人质三人，以色列军官一人，乌干达士兵若干人及劫机者七人被杀。 还有好多人受伤。 乌干达的飞机和设施不是受到损害，便是被毁坏。

一方面我们为生命的丧失及滥施破坏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心中却在猜想，如果谈判再继续下去，是否就可以避免了所有这一切。 因进一步谈判而冒的风险岂不是胜过了可能会使更多人死亡的军事行动所冒的风险？ 军事行动的性质只限于拯救人质的这项事实不应掩饰此项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及侵犯乌干达主权和领土完整这项更重要的事实。 不管这次侵犯是否是暂时性的，它终究是一次侵犯。 如果这次侵犯是长期性的，它岂不就等于是占领了乌干达的领土。 这一点是无法加以怀疑的，而且大家都立即确实承认了这个事实。 但是，有些国家要为这种侵犯辩护，同时其余的国家则对这种辩护及其对各会员国间的关系的影响，表示疑问。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因此，以色列在乌干达的领土上使用武力确是极严重的一个步骤，而奇怪的是以色列这样做了居然还自称有自卫权。

只有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才承认有自卫权。以本案来说，受以色列武力攻击的主体是乌干达。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攻击显然是侵害了乌干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安全理事会不应该在它的决议中放过这一次攻击，不加以注意。

就劫持而言，为什么不在发生劫持之后立即向理事会提出这件事，以便理事会回顾其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二年的决定，从而也许可以加强乌干达的立场？理事会应该在发生劫持之后立即讨论这个问题，以便考虑用适当的国际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并照某几个理事国现在提议的办法防止今后的劫持。无视以色列的攻击而现在一味注意对付劫持的措施，不管这种措施是如何合适，如何急迫需要，确实都是很可悲的。理事会的这个决议应该明确地讨论到这个问题的两方面。

如果安全理事会要根据宪章规定的责任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它便应该对以色列袭击的事情有所表示。如果它一无表示，它便很可能引起一连串会有更悲惨更深远影响的反应。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声明中所表示的忧虑也就是这一点。昨天坦桑尼亚代表说：非洲国家都认为以色列对乌干达的袭击是对整个非洲的一次严重挑战。非洲国家都明确地认为，要不是上帝的恩宠——或者也许是油箱的缘故——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非洲国家。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照非洲各国要求的方法再向非洲各国提出保证。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说了夸讲我本人的话。

现在我请那些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团发言。

哈罗德·沃尔特爵士（毛里求斯）：我再度聆听了以色列代表的话之后必须声明：如果我的心中曾经对他的英文造诣及他显然擅长的完善辩才存有怀疑，这种怀疑已经消失了。我承认：甚至于连最恶劣的案情他也都可以把它说得非常头头是道。

但是，这使我提出下面的一点：我很感到惊奇，有了25年的议会经验之后，竟然发觉辩论的水平已降低到专对人不对事的地步。我记得，我曾经在参加发言时说得非常明确：我决不对任何人作私人的攻讦，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就提请本理事会辩论、评议和推论及证明属实的案件发言。

以色列代表居然感到遗憾，认为本理事会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过任何一句话，认为当初发生的事据称今天仍在乌干达继续发生中。让我来纠正他。事实上，我已于昨日联合王国代表发言及他与我谈话之后，立即电请担任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我国首脑，利用他的全部影响力，与乌干达总统接洽，确保每一件事都照法律办理，象上面所述的邪恶事情是不应该容许的。

他并在他的发言中说，我未在我的那一部分辩论中提到报纸上所载的一些事实。现在他会记得，他曾经引述七月四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我要告诉他，在星期日那一天我由于患了重感冒，一直到下午五点左右，仍未起床，所以我并未看星期日的报纸，但是，我承认在这里提出的证据。从那时候起我便注意到以色列代表引述的遗漏之处。非常明显，这种遗漏并不是恶意的。它既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遗漏了它是因为并没有人提请我注意，我也未发现它。

以色列代表也提到了与他如此讥讽描写的一个国家相似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制度。让我提醒他：我国政府可能就是民主政治的最高峰，在那里每星期二和每星期五都让反对党批评政府，随时都可以动议反对政府，可是双方彼此痛骂的那些成员事后却坐在一起饮酒社交。它永远不会变成对人的。所讨论的只是问题。

我并不是在这里为任何人辩护。我在这里是受非统组织之托来辩护一个原则问题：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也是一个非洲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是否已被侵害

——是或不是。但是，照今天的辩论情况，因与果——正象印度代表刚才所说的——已被混为一谈。我们必须加以非常明确的说明：非洲统一组织想要从本理事会求得的是在言词上提出警告，以期永远不再发生这种侵害领土完整的事情。

以色列代表也充分地援引了报纸上的话。我要回敬他一句话说：他也把他所引述的七月九日的那一份很负责的《世界报》的下面很重要的话遗漏了：

“有人援引了国家保护其国民的权利，也就是一些法学家所说的保护人类的权利，作为侵害乌干达主权的理由。但是，让每一个国家自己来鉴别这种权利不但违反联合国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大家都忘记了，法国外交当局主持的谈判还在进行，并已有了很可观的结果，更忘记了以色列袭击恩德培时谈判尚未决裂。法国受到了所有各有关国家的指示，要把谈判进行到底，即或失败，也必然会判定失败的责任。

本理事会应该注意到同一报纸《世界报》中有下面两段话：

“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肯定地谴责在坎帕拉劫持大型客机及扣留以色列公民和机上人员作为人质。但是，该协会说：以色列军队却于进行谈判寻求解决办法时，从事空运作战，结果侵害了乌干达国家主权，并使许多人受害。它认为所作出的罪恶行为并不成为违反国际法最基本规则使用武力的理由。

“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抗议某几国政府首长在赞扬违反联合国宪章执行这一行动的策动者此时所说的话。这些首长居然不顾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土完整及其国民的生命，证明他们都有种族主义的色彩。”

如果以色列代表团因为我讨论到语意问题而见怪，我只能表示抱歉。我这样做无非是要使辩论轻松，而不使它有它曾经一度有过的严肃气氛。如果以色列代表因为我设法用双关语来说明一句话而认为有伤感情并见怪，我是感到非常抱歉的。我敢向他保证，我丝毫无意轻视他的辩才，我必须加以说明，他的辩才是很少人能匹敌的。我敢向他保证，绝对无意轻视他所说的话。事实上，如果本理事会还

记得，我曾于说下面那句话时本乎它的意旨加以说明过：

“……这个世界并不是属于罗马的，同时，罗马人也不能屠杀别国的国民而不受惩处。”（第一九四〇次会议，第14页）

这就是我说过的话。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加以澄清。以色列代表说：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送给主席先生阁下的这封信是由埃及一起发起的。这是不确实的。这是非洲统一组织全体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国家首脑会议于决议时指名由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因为我是部长会议的现任主席——及其余两个国家，几内亚和埃及，支持乌干达，将它的案件提送安全理事会。让以色列代表知道，我们全体都对在恩德培发生的生命的丧失表示同情。我们全体都痛恨国际恐怖主义。但是，我希望他也有勇气说，迄今为止使联合国结合在一道的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得侵害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

我再把七月九日的《世界报》读一遍：

“如果这架飞机降落在阿姆斯特丹的史吉波尔机场或者巴黎的沃尔莱机场，难道以色列代表也会说，他敢作同样的袭击吗？他会这样做吗？或许是这样做的。”

但是根据所有的或然率来看，我说是不会的。但这个国家是乌干达。这个国家可能是肯尼亚；它可能是坦桑尼亚；它可能是毛里求斯。法国大使要求乌干达国家元首让该机降落，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汽油可以续飞，元首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原是无挑剔的执行人道主义的行为，但今天竟有人把这种行为与我们所听到的安全理事会某几位代表所说的尖刻话相提并论。

阿卜达拉先生（乌干达）：以色列代表团所作的指控无中生有。首先，关于同谋问题，以色列代表曾提到过库若先生所说的话，不过库若其人只是讲述恩德培事件的许多人中的一人而已。另一方面，其他的机上工作人员曾提出对我国总统有利的报道。例如，飞机的机械工程师和机长的报道都可以在“世界报”上看到。

关于布洛克太太的事情，我已在星期五告诉过理事会，没有别的可以补充。那天我已说过，以色列入侵部队带走了留在恩德培的全部人质，包括布洛克太太。

让我们言归正题。我们来此是为谴责以色列侵略，别无他事。因此，我要以乌干达代表团的名义断然驳斥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的代表对我国所作的一切指控。他所说的话只是一套骗人的谎言。

这辩论只是强令我们聆听一套谎话并使我们大惑不解。主席先生，你有责任领导这个理事会，使我们能够达成一项对以色列的具体谴责。

当然，以色列有权在这里吹嘘它怎样屠杀乌干达官员和人民以及破坏乌干达的财产，而那些所谓的超级大国则试图为以色列掩饰。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按照上帝的旨意终将把今天自命为超级大国的那些国家埋葬。

虽然我们是小国，但是我们不是小孩。我们不受玩弄。

以色列代表谴责乌干达，所有非洲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是弱小国家，所以不能同美国、联合王国和以色列打仗。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无法使它们屈服。但是我要正告你有朝一日历史将证明我们所说的话。

我保留我以后进一步答辩的权利。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以色列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实体的代表再次攻击我国和我国领导人，就好象他攻击其他许多国家和领导人一样。我们已习惯于以色列传统的荒谬指控、恣意捏造和不道德的歪曲。我们知道他试图避开主

要的问题，那便是以色列违反所有已确立的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的规则，对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罪恶的进攻。

赫佐格先生一再对我国慷慨陈词。我已说过，我深知他如何痛恨我国和我国领导人。他知道他一如往常地在撒谎。

上星期五，我曾对他作过扼要的答辩。现在，我要提请理事会注意我较早提出的扼要而不完全的答辩。此时我不需用很长时间来发言，尤其因为自上星期五以来，几乎在每次会议上我都说话。我不要滥用各位理事的特许。我要保留我的发言权以便再次答复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的荒谬指控和鄙劣歪曲。

我知道我不能同特拉维夫种族主义的代表一样说下流话。我的英语知识有限而浅近。英语不是我本国的语言而是代表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那个爱尔兰人的本国语言。我只限于用正确——我指的是道德上的正确——和文雅的英语。

为了尊敬这个崇高的机关，我的发言将力求精简明确，我将提出简单而可靠的事实和真相驳斥他的谎言，歪曲和不道德指控。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现在时间已晚，我相信大家都有点倦了。我昨晚已说过，我们在辩论这个问题时应设法力求简明，冷静和毫不激动。如果我在这样晚的时刻行使我的答辩权，那只是因为以色列代表所作的某些发言不能不加以驳斥。如果必要，当然我会请求这个崇高的理事会的特许对以色列代表发言的某些方面作出更加完备的答辩。事实上，对此我必须坦率指出，我无意行使这个答辩权。我始终认为除非一个人迫不得已，是绝对不须行使答辩权的。特别是就以色列代表来说，我将不这样做，只因为我知道以色列代表自知在理事会或大会中陷于孤立，因为他常常抱怨诉苦。我不要给予以色列代表对这许多答辩权的行使必然提出答复的特权。不过，尽管有上述种种考虑，我还是觉得我有义务阐明一些意见。

第一，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说受宠若惊，但是肯定地我要说我已注意到以色

列代表曾以他相当长的发言对我的发言有所答辩。我相信理事会对这会作出它自己的判断。不过，对以色列代表所说的几件事我必须立即加以驳斥。

在安全理事会内外的我的许多朋友能够指责我许多不是，但是肯定地他们却不能指责我说了我所不相信的事物。我要正告以色列代表，我不惯于作出不反映我的感受的发言。如果我说我认为我远比以色列代表了解坦桑尼亚政府的主张，我请理事会相信我。我希望以色列代表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以色列代表不同意我的发言，我在发言中说过以色列在恩德培的军事行动构成了对非洲大陆的一项威胁。明显地，以色列代表故意地无视一项事实，即我所发表的这项见解事实上便是卓越的非洲国家组织部长会议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在他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中所更为有力说明的一项见解。如果我可以重新唤起我的以色列同事的记忆，则我只须提到以第 S/12126 号文件印发的那封信中所说的一句话：

“以色列向乌干达发动的这次史无前例的侵略不仅危及乌干达和非洲，也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S/12126，第2页）

这是一项庄严的声明，是由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特别委托的一位可信赖的政府首脑兼非洲领导人庄严地递交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声明。它不是轻率提出的一项声明。也不是轻率提出的我国政府关于那件事情所发表的声明。

以色列当局在恩德培采取的军事行动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地侵犯乌干达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自从这次辩论开始以来，我听到了以色列代表和理事会中似乎赞同以色列代表某些意见的代表们所作的许多发言，在那些发言中没有一句话否认过这个重要因素，即侵犯乌干达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一因素。

当我们说以色列的行动不仅构成对乌干达的威胁也构成了对非洲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随便说的；因为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从我们自己数世纪的殖民地经验我们知道一个非洲国家所遭受的罪恶昭彰的行动应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前车之鉴。讲

到以色列的行动这一特别事例，我们有记录在案的类似实例，即以色列的行动通常对非洲的最凶恶敌人提供榜样。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本组织的时间不久，但是我知道——当以色列当局开始对它的阿拉伯邻国进行它所谓的一连串闪电攻击的时候，首先赞扬国际法中的这个新规章的人便是南非法西斯政权。 无论何时只要以色列对黎巴嫩、约旦、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突袭，罗得西亚和比勒陀利亚便欢欣庆祝。 因此，不足为奇在以色列突袭恩德培的这一特别事件中，从其他国家发出的最热烈祝贺，一种最热烈的赞扬正是来自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总理的约翰·沃斯特先生，他认为以色列采取的行动是一种勇敢行动，基于明显的理由，我认为他将计划如何把他们从以色列行动中学来的伎俩付诸实施。

所以，我极其庄严地指出，我认为以色列对恩德培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是对乌干达的一种威胁而且是对非洲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种威胁。 我认为这是国际关系中非常危险的一个先例。 我们认为就世界上弱小国家的权利而言，这甚至是更为危险的一个先例。 我完全同意毛里求斯外交部长的意见，即过去曾有劫持飞机的情事，但是没有人曾经设想以色列当局会在雅典、巴黎、伦敦或欧洲其他地方采取军事行动，更不必说美国或加拿大了。

以色列代表或多或少反对我的见解或以暗示或则直接地说过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均重利害而轻原则。 他作了我所认为的一次长时间的关于原则说教。 但是我要正告以色列代表，我国坦桑尼亚最重视原则。 我必须非常坦白地指出，重视原则并非易事。 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就因为重视原则而吃亏。 本理事会有些理事知道此种情况，如属必要，我将再次请求理事会的许可，详细说明坦桑尼亚政府因采取一种原则性的主张以致引起经济和其他困难的许多情事。 所以，我们不需要聆听关于原则的说教。 事实上，我们认为而且我们在本组织中一贯主张，象我们那样的弱小国家能够保卫它们自己的唯一途径便是锲而不舍地坚守原则——国际

法原则、国际道德原则、国际合作原则以及最为重要的本组织宪章中的一切原则。这些原则是能够保证弱小国家生存的唯一保障，因为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使人相信我们会有足够坚强的军事地位用那些强大国家所能保卫它们自己的方法来保卫我们自己。因此，我们重视原则。

关于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一事，先前我已作过明确解释，现在我要再度加以明确解释，我国政府，我国人民和我个人都认为生命系属神圣不可侵犯；人类生命的丧失至为可悲，不论其为犹太人的生命，非洲人的生命，阿拉伯人的生命或其他任何人种的生命。人类生命必须得到维护，人类生命必须得到保护，并且必须采取一切行动以保证人类生命得到维护。但是，我大惑不解，即以色列代表曾侃侃而谈辩护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为他们认为生命濒临危险的那些人提出有力的辩护，但是对于因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结果在恩德培丧失生命的那些乌干达人却完全没有表示任何哀痛和深厚悔意。然而以色列代表在此次理事会会议开始时的发言中是谈论不可厚此薄彼的第一个人，并且表示他的政府害怕在恩德培机场采取的他所说的厚此薄彼的做法。

我们希望他至少能告诉理事会说他的政府如何对它的部队所造成的那么多乌干达人的死亡以及它的部队对乌干达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表示歉意。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并不能使人们十分相信以色列代表所说的关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论据和他所提出的指控，虽然他的指控是间接提出的，他指控说，我们没有举出某一具体事例或另一个具体事例，无论如何便是对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漠不关心。

以色列代表再次试图与我们争辩，因为我们曾强调理事会当前的问题是乌干达的主权受到侵犯的问题。我审慎地不欲投入关于我们是否应讨论劫持飞机的一种程序性讨论，因为我十分了解理事会的议事规则。我也知道理事会中的惯例，即使是一个不在议程上的问题和完全与主题无关的一个问题，理事会的理事可以随便

说他们要说的话，而理事会主席或其他任何理事均不得阻止某一位理事说他要说的话。

因为这些考虑，我审慎地不提起我们是否在此召开会议讨论劫持飞机问题。但是，不管对这次辩论的举行给予怎样的考虑，有一件事却是毫不含糊的，即这次理事会会议是按照非洲统一组织通过其主席提出的特别请求来召开的，其唯一目的为讨论以色列对乌干达主权的悍然侵犯问题。

因此，我们要讨论这个特别问题。我们先前已经说过此事，现在我要把它再说一遍，我注意到以色列代表在引述决议时颇多选择。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曾大事引述一九七〇年通过的关于劫持飞机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我关切地注意到他巧妙地避开而不复大事引述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最近通过的关于谴责以色列侵犯乌干达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的决议。

我还有最后一点要加以说明。以色列代表广泛地提到坦桑尼亚与乌干达的关系、乌干达与肯尼亚的关系以及东非局势。作为坦桑尼亚的代表，我或许比他更了解乌干达与坦桑尼亚之间的事态。但是，我不揣冒昧地认为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是讨论以色列侵犯乌干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我不揣冒昧地认为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乌干达的内部情势或人民对乌干达政府的爱憎问题。在这里所讨论的不是乌干达，我们现在要讨论乌干达所遭受的一种行动；我认为没有比非议侵略行动的受害人并使其成为我们讨论的主要罪犯和主要歹徒这件事更为荒谬的了。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本来不预备讲话的，但是以色列代表今天在他的发言——或者简直可以说是给全体在座诸位训话——里完全没有对安全理事会上次会议中就此事所说的话做答复，而且，正如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所正确指出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侵略乌干达。这里并没有其它的建议，而且没有人正式提出任何其它建议。

以色列代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有两个标准；他创造了两种道德规范。他替那件难以辩护的事制造了一套理由来辩护。昨天和今天他还企图指控我们。他指控整个安全理事会；他指控联合国；他甚至建议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应该被驱逐出去——这显然超出了与正在讨论的有关项目的范围。我完全地、衷心地同意先前发言者就这事所发表的意见。

身为苏联代表，我要指出下列一点。最危险的事还不是以色列代表所说的话，而是他所要求的事，他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应该拿以色列做榜样，象以色列那样进攻乌干达，杀害乌干达公民，造成该国巨大的物质损失而对之甚至不做或无意做任何道歉的表示。他所说关于人命的话我们句句都懂；只是不懂他对人命何以使用了双重标准：杀害乌干达人就可以。而杀害任何其他他人就不可以。我们认为，任何人都不该被杀害，而杀任何人都是不对的。这次我们讨论的是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侵略性武装攻击。

在这件事上，还有一点令我吃惊。无论如何，联合国总还是以以色列的创造者奇怪的是，在安全理事会居然听到以色列对这个曾经创建该国，给该国以生命的组织进行如此傲慢，粗鲁的攻击。无论如何，这等于是说：“虽然你是我的母亲，见鬼去吧。”这真是可羞的事。身为一个法学家，以色列代表知道他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种道德规范来替他这种行动做辩护。

以色列代表在他今天的发言中，利用安全理事会来指控一切把以色列军国主义者的行动评断为对一个主权，独立的非洲小国——乌干达共和国——的侵略的国家。

这是故技重施。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会议上与以色列代表开会，但我对他从前的那些发言都知悉甚详。以色列代表今天以如此荒谬的发言攻击其它国家的作法也不是第一次；这种作法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今天全部的发言就是企图把安全理事会的注意转移到任何与议程项目——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主动侵略——不相干的事上去。

不管以色列代表说什么，不管他引证什么法学家，事实上他是在要我们讨论旁的事情。我们在星期五说过我们愿意谈这件旁的事。我们愿意；我们并不是在规避它。正好相反，我们和其他国家一道，愿意采取新增的措施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行动。

但是办事情要一样一样的来。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件事。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以色列对乌干达的武装侵略，杀害乌干达公民，造成乌干达的物质损失。正如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正确地向安理会指出的，以色列代表对此事甚至毫无悔意。以色列代表要别人对旁的事表示悔意。而他却全无这种表示。

我们是在讨论一个项目。以色列代表为了要把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项目的讨论转移开去，按照他自己那套故技，他又施展惯用的捏造手法。我本不愿说这样粗鲁的话，但由于我国，还有其它国家，遭到了污蔑的攻击，事实迫使我不得不说。我说过，以色列代表实际上攻击了安全理事会所有的理事。在这张会议桌上，在这间会议厅里这种攻击是毫无道理的。

可是以色列代表估计错了。他无疑是个好律师，但我看他那套律师作法与政治不见得相适合。他不可忘记，无论他的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如何，此地大家所代表的都是主权国家，如非议程上列为议题，这里不是讨论别国的行动，政策或制度的场合。

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只有一个项目。我也说了这个项目是什么。然而以色列代表仍旧蛮干，公然施行污蔑性攻击。这样一来，他就是在企图使议程上一个具体项

目不能得到具体而认真的讨论，并以外事来混淆视听。

发过言的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和非理事都谴责了侵略乌干达的行动。大家都听到了他们的发言。现在以色列代表却要人们拿以色列做榜样。这就不合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了；这变成了海盗和侵略。这是必然的结论。

以色列代表已经对苏联施用了对他而言可说是正常的犹太复国主义式攻击。他应该在这个会议席上收拾起这一套。毕竟，他代表一个国家；他不代表某种组织。他懂这一点吗？

非常明显地，对我国的污蔑是毫无根据的。我无意在此细谈他所提的事。如果有必要，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来仔细回答他的发言。

苏联代表团断然地拒斥以色列代表企图混淆我们讨论的事项以达到其欺骗的目的。为了顾及礼貌，我只要说，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以前应该多想想他说过的话。

以色列代表企图用国家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些话来为侵略行动辩护，这是站不住脚的。他企图以人类自由原则提出来的许多论点也同样站不住脚。这些说法换一个不同的场合可能会合适些。不管以色列代表利用什么借口，不论他依仗什么权威来企图保护自己，我仍旧觉得，他还是掩盖不了对一个非洲小国进行侵略攻击的事实。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会拿以色列做榜样。

我们讨论的这种行动造成了对非洲——并且不仅只是非洲——和平的极危险的威胁。我们实在必须在安全理事会里思考这件事。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认真考虑。

米尔扎先生（巴基斯坦）：以色列代表提到我昨天的发言时，没有提及我所提出的任何论点或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反而对我国作了一些毫不相干的、毫无根据的批评。

以色列代表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如果我所代表的不是一个把所有政治反对党关在监狱的政权，他会比较尊重地对待我的发言。

以色列代表是个军人——至少他来这里之前是个军人。不过，他的工作人员之中也许有一些合格的人员能够不费力地把有关我国的实际情况向他作个简要介绍。从他今天的发言来判断，他对我国情况的认识似乎相当肤浅，因此我们别无他法，只得非常简短地给他讲述事实。

巴基斯坦政府是个民主政府，是巴基斯坦人民在自由、公正的选举里正式选出的。政治体制是议会制，国家政府向国民议会负责，国民议会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

我们确实为以色列代表表示关切我国的政治反对党所感动。可是，他说所有政治反对党都被关在监狱里，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只有一个反对党被禁止，根据所得到的证据，我们发现他们正从事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活动。以后，这个禁令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得到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的确认。

也许以色列代表有兴趣知道在巴基斯坦有其他反对党，例如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会社和伊斯兰长老会，而所有这些反对党都积极地、充分地参加国民议会和省议会的工作。

我希望，以后以色列代表要针对我们辩论的主题，不要对一个会员国作这种毫无根据、毫不相干的发言。

主席：我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为行使答辩权而发言。

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色列代表在第二次发言里好几次提到我国。开始的时候，他说南斯拉夫急想表明它与所谓不结盟国家的意见忠实一致。

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我们不仅急于表示我们与所有不结盟国家——不只与就这个议程项目发言的不结盟国家——的立场一致，而且南斯拉夫事实上和所有其他不结盟国家一向积极参与发展和订定一种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关系政策。

这就是说，我们一直鼓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原则，这已经成为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从本组织成立以来就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原则。因此，我们不是一个所谓的不结盟国家，我们是在致力于一个奉行这些原则的运动，我们一定继续坚持奋斗在国际行为上执行并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当然，谁违背了这些原则，就会受到所有不结盟国家包括我国的谴责，我国碰巧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发起国。因此我对于他提到我们体现了我们与不结盟世界的弟兄们团结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

其次，以色列代表说，南斯拉夫显然被极端的反以色列态度和赞助目前世界上新的反犹太主义事业所蒙蔽了。我认为，赫佐格先生丝毫没有道德权利谈论反犹太主义，并把它同南斯拉夫联系在一起。我要提醒他，在我们的解放斗争中，我们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与纳粹进行了战斗，许多犹太人参加了民族解放军；许多犹太人成为现代南斯拉夫的杰出领导人；所有南斯拉夫的犹太人享有其他民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同样的权利；我们有不少犹太社区的成员积极活跃于现代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其他服务领域里。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所有那些曾经是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和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暴行有关的人都已逃离南斯拉夫，不幸地，现在仍然居住在那些正在支持以色列在国际关系上的不负责行为的国家里。所以，我要告诉以色列代表，在这方面他应当向它们诉说，并要求这些国家——而不是我国——根除反犹太主义。

以色列代表说国际恐怖主义使其他国家遭受到的灾难不比以色列遭受到的少，国际恐怖主义将使这些国家的代表自食其言，“吃下”他们在安理会辩论中所说的话。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威胁——这对以色列代表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因为他一直在威胁会议厅里的每一个人，而他代表的政策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当这种威胁成为他努力为以色列对联合国的一个独立会员国进行五十三分钟之久的侵略和侵犯这个国家的主权进行辩护的一种手段时，这就更为危险了。

我要表示我完全赞同我的坦桑尼亚朋友说的话：企图为暂时的侵略进行辩护事实上就是目前的真正危险，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长期的侵略。

所以今天我们要应付的事实上就是以以色列在国际关系上的新阴谋，企图使它对别国的侵略和暂时侵犯别国的领土完整合法化并且获得支持。但是我确信以色列将得不到支持的。相反，我确信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这个国际组织——将会想出办法防止这种行为和这种阴谋。

至于以色列代表说，我的发言里没有说到这次突击的其他受害者，我要劝告他再次读一读我的发言，看我是怎样说的。

总之，所有这些证明了以色列继续蔑视宪章所规定的国际行为基本规范，以色列的侵略政策是世界大家庭和本组织所熟知的，屡次受到了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国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强烈的谴责。以色列再次显露了其侵略意图和胃口，以侵略行动来达成它的目的。以色列对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奸诈袭击，清楚表明以色列继续藐视联合国的决定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坚持它的侵略政策，威胁其他独立国家的安全，从而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赫佐格先生在这里所作的第一次和特别是第二次发言就是这种行为的例证，这是深植于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的本性里。所以，我对我昨天在这个会议厅里所说的话没有什么补充。

我要保留发言权，以后如有必要，我要作更为详细的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我无法了解利比亚代表的发言，他说我恨利比亚。我从来没有这样说。事实上，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一些是利比亚人。

但我应该说，也许引用苏丹尼迈里总统昨天才说的话是贴切合适的，他说，“安

全理事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决议来终止利比亚政权的疯狂行为，这个政权威胁到整个区域——阿拉伯和非洲——的安全”。这不是我讲的，是尼迈里总统讲的。

并且萨达特总统昨天宣布：“这不是秘密，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者卡洛斯现在正住在利比亚”，他还进一步详细描述利比亚的牵连。

但是我的利比亚同事可能愿意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份通讯社的报导，大意是说正在访问澳大利亚的利比亚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书记穆罕默德·赫贾齐先生，曾表示他不支持侵犯乌干达的自由，但是因为那些人质持以色列护照——在他看来——以色列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把这件事说出来，无非是有点好奇。

我要向南斯拉夫保证，我没有发出任何威胁；我不打算这样做。我说出事实，而且我私下希望并祈祷我所说的那种情形不会成为事实，因为我相信南斯拉夫永远不必、任何其他国家也不必面对我国政府十天前必须面对的那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对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和我的坦桑尼亚同事问我的话，即“以色列是否会在阿姆斯特丹、巴黎、雅典或其他欧洲城市进行同样的营救工作？”，我的答复是非常明确的：上述的这些国家政府没有一个会象乌干达政府那样降尊屈从；他们决不会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帮凶，而事实上，其中两次，当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国土上时，他们积极合作，采取了行动打击恐怖分子。

最后，对苏联代表，让我提醒他，以色列不是联合国建立的。以色列建立了已有三千多年，这个国家在人们不知有所谓苏联之前好几千年就给世界带来了道德规范。联合国只是重新肯定历史和世界对犹太人所欠下的债而已。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说过，迟些时我将驳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代表的谎言、指控和曲解。但是现在他使我不得不先说一句话：赫佐格先生当然可以有利比亚朋友。这是不成问题的。作为爱尔兰人也好，作为犹太人也好，都可以有利比亚朋友。我们不反对爱尔兰人、我们也不反对犹太人。我们所反对的是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和恐怖主义分子。

此外，我要指出赫佐格先生的发言的另外一点。他一直重复着，一次又一次地说，利比亚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补给者，利比亚正鼓吹国际恐怖主义。我不知道谁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指何而言。国际恐怖主义这整个问题，使人提出一大堆问题：谁正在从事国际恐怖主义？什么是国际恐怖主义？谁要对国际恐怖主义负责？有许多团体都叫做国际恐怖主义者，但他们有国家背景或思想背景。不过许多团体都被渗透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真相。

赫佐格先生是他的国家、他的假冒的国家以色列的特务机关头子。当他退休了回到他的绿葱葱的爱尔兰时，也许有一天他会写他的回忆录。那时候他将不会受到这个假冒的国家以色列的保密法的限制。说不定那时候以色列已经成为历史了。

主席：没有其他代表团希望行使答辩权。中国代表要回答一些代表所说的话，我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周南先生（中国）：在结束本次会议以前，我愿以中国代表团名义，衷心感谢巴拿马、罗马尼亚、日本和印度代表对朱德委员长的逝世所表示的诚挚悼念。

主席：经过协商之后，大家同意我们把明天上午空出来，进行可能的协商并安排于明天下午三点开会，以便继续进行这个项目的讨论。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